

納詩入志——

范成大《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新創與特色

李 奇 鴻*

摘 要

范成大為南宋四大家之一，不僅是詩歌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著作的《吳郡志》也是方志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探討過去在方志史研究較少論及的問題：詩歌材料與方志書寫之間的關係，即是討論范成大如何運用詩歌材料形塑地景的問題。本文首先說明《吳郡志》引詩體例的新變，接著以「地景」與「土物」為例，指出《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主要有取捨、排列、調整敘述側重面等方式。本文強調，所謂納詩入志並非僅僅在羅列詩歌材料，而是需要兼備精確理解詩意，以及熟悉地志書寫兩個方面。也可以說，《吳郡志》的納詩入志前所未見的將地方刻畫得更加豐富、細緻。

關鍵詞：范成大、《吳郡志》、納詩入志、方志

一、前 言

范成大（1126-1193）為南宋四大家之一，不僅是詩歌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著作的《吳郡志》也是方志史上的重要著作。方志的概念起

2018年1月24日收稿，2018年5月9日修訂完成，2019年1月15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源自春秋時代，並於中古時期形成地理書，到了宋代發展為方志。¹ 將文學作品視為方志材料，則是宋代才有的現象，無論是早期的研究，如洪煥椿所總結《吳郡志》五項特色之一的「文史結合，以詩證史」，或是稍晚的林天蔚將「增載『藝文』」視為宋代方志所創新的體例，² 兩者都有注意到「納詩入志」的現象，將之視為兩宋方志發展的趨勢。本文觀察到《吳郡志》除了引用詩歌的數量，其引用形式與運用方式都不同於過往，進而聚焦在方志與詩歌材料之間的關係，主張《吳郡志》積極地運用詩歌材料來形塑地景、豐富地方的人文歷史，為范成大晚年值得關注的著作。

在方志史研究中，有學者將《吳郡志》視為吳地方志成熟的標誌、界碑，其體例更為後世所法。³ 但是，當我們將《吳郡志》置於更大的方志史來看，如何瞻（James Hargett）的研究表明，方志主要的特色共有三樣：「詳」、「博」、「教化」，這些概念在北宋已形成，⁴ 稍晚於《吳郡志》的《景定建康志》則在體例上更為完備、「對後世影響甚大」。⁵ 《吳郡志》似乎處於一個過渡期的階段，且沒有留下有關該志的編纂始末或是體例說明，因此較難對該志在方志史的意義有所抉發。然而，若借鑑包弼德

-
- 1 張國淦編著，《中國古方志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敘例。
 - 2 洪煥椿，〈南宋方志學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學的形成〉，《史學史研究》1986.4: 16。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25。
 - 3 例如：林天蔚認為宋代是地理學蛻變為方志的轉捩點，關鍵在「史」、「地」兼重，在南宋更如斯。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33-36。其他研究可參洪煥椿，〈南宋方志學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學的形成〉，《史學史研究》1986.4: 14-22；呂志毅，〈范成大《吳郡志》——吳地定型方志的界碑〉，《黑龍江史志》2003.6: 18-22；楊洋，〈宋代方志的演變與發展——從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到范成大的《吳郡志》〉，《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3(2011.9): 20-23。
 - 4 James M. Hargett 何瞻，"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1996): 405-442 and "Historiography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in Thomas H.C. Lee, ed.,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87-306.
 - 5 中國方志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方志大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景定建康志」，頁232。

(Peter K. Bol) 將婺州方志視為文化地理 (culture geography) 之想法，⁶或許能從文化地理的角度說明「納詩入志」對於當地文人的范成大之意義。⁷進一步說，從范成大形塑地方地景的角度，不只能詮釋《吳郡志》引用全篇詩歌的形式意義，也能藉由詩歌材料的順序、選擇觀察在范成大眼中的地方是何樣貌。本文將指出，范成大所揀選的詩歌材料標準，不只是「詳」、「博」的方志規範，透過詩歌材料的選取與排除之間，「地景」也會隨之立體而鮮明生動。因而，從使地方地景更加富有人文、歷史內涵的角度來看，《吳郡志》運用詩歌的方法可謂方志史意義的新創。

近來，譚清洋指出，《吳郡志》引用詩歌的數量上大於文章，且將成組作品收納於一條目中：

許多詩歌都是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創作的，成組材料的呈現，讓我們可以更明晰地看到晚輩詩人與前輩詩人之間的關聯。⁸

譚清洋從《吳郡志》詩歌引用情形，認為該志以地方為視角，呈現的是不同時刻的作品之間的關聯，乃是「構建了立體而動態的蘇州詩歌史」。譚清洋的研究取徑可歸類在「文學地理學」⁹的支脈，著眼在一地之內發生的文學活動，依此看待《吳郡志》所載錄成組詩歌背後的文人社群。

筆者同意上述研究觀點，但《吳郡志》的研究取徑不只有詩歌材料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有詩歌材料與方志書寫之間的關係，即是討論范成

6 Peter K. Bol 包弼德,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 37-76.

7 包弼德的想法背後有自郝若貝 (Robert M. Hartwell)、韓明士 (Robert P. Hymes) 以來的學術脈絡，以及自己在 *This Culture of Ours* 所主張南宋士人轉型成地方精英的趨勢。本文借鑑包弼德對 James Hargett 研究的不同看法：James Hargett 所著眼的是方志作為官方文書的歷史；包弼德則強調方志能作為地方家族精英展現對於書寫地方歷史的權利。本文雖不在包弼德的學術背景之下，但同樣認為《吳郡志》的書寫較偏向地方、而非官方。除了全書未見有官方重視的移風易俗之意，在成書刊刻之時也受不明人士刁難，以致郡守「憚莫敢辨，遂以書藏學宮」，可見《吳郡志》編纂動機或非如一般方志受地方長官所授命。

8 譚清洋，〈地理學家的詩人底色——范成大《吳郡志》的詩歌史料價值〉，《哈爾濱學院學報》36.5(2015): 74。

9 關於「文學地理學」的介紹，可參黃霖，〈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文學評論》2007.5: 205-206。

大如何利用詩歌材料形塑地景的問題。研究指出，范成大的詩歌作品有「以筆記為詩」的傾向，¹⁰ 是以「記游」以及「土宜風俗」的敘錄態度來寫作詩歌，而他也有《菊譜》、《梅譜》等譜錄作品。諸現象顯示范成大熟捻於詩歌與敘錄（包含譜錄）兩種寫作方式，進一步說，在范成大觀念中，詩、文之間能夠加以分辨，也同時也能透過某種手段溝通兩種體類。本文乃就范成大將詩歌納入方志書寫時，如何藉由取捨詩歌材料或是調整敘述以納入詩歌材料的問題切入，或可增擴上述議題的思考層面。

誠如上述，詮釋納詩入志現象當中撰者對詩歌材料的理解，具體而言就是范成大如何透過詩歌材料的取捨、調整敘述等方面連結詩歌與地方，從而形塑地景。據筆者初步觀察，《吳郡志》以詩歌為材料最集中的類型共二：第一種是「地景」類，包括古蹟、祠廟、山、川、宮觀；另一種是「土物」類，內容是吳地的品種名物，如太湖石、綠頭鴨、鵪鶉、蟹等等。地景類在過去方志已見，內容多是位置、面積、史事等客觀描述，而《吳郡志》大量援引詩歌材料，呈現的是詩人主觀感受；土物類則是以物為主的描寫，《吳郡志》多以「詠物詩」為材料；地景與土物相關的詩作在傳統詩歌是常見題材，但進入了方志書寫，便面臨如何權衡地方與人物之間的難題。此乃本文主要論述之處。

本文的研究步驟是，首先整理吳地歷代方志詩歌材料的使用情形，說明《吳郡志》的新創之處，接著以地景與土物兩端為例，說明《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特色。《吳郡志》是范成大既為詩人又是撰者的精心經營，透過這些安排，詩歌才能成為方志書寫之一環，這使得《吳郡志》成為方志史、詩歌史上的珍貴個案。

二、歷代吳地方志中引用詩歌情形

現今流傳宋人地志倖存不多，但透過書錄、殘篇的記載，可知南宋時方志大為盛行。¹¹ 清代的朱彝尊列舉宋代代表性的地方志，比如梁克

10 程杰，〈論范成大以筆記為詩——兼及宋詩的一個藝術傾向〉，《南京師大學報》1989.4: 52-56。

11 詳參顧宏義，《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家《三山志》、范成大《吳郡志》、施宿《會稽志》、羅願《新安志》、陳耆卿《赤城志》、潛說友《臨安志》。¹² 在這幾部方志中，《臨安志》篇幅最廣，內容最詳，這是由於臨安為南宋首都的緣故。在《臨安志》之前，《吳郡志》堪稱體制齊全、內容繁複的地方志。《吳郡志》與前述方志不同的是大量引用詩歌作為方志材料，且引詩法也與以往方志不同。這是吳地地志傳統，或是范成大個人的創發，當是需要釐清之部分。因此，以下考察現存三部關於吳地的地理書與方志當中的運用詩歌材料的情形，並說明《吳郡志》在體例的新創之處。

（一）晚唐陸廣微《吳地記》多引史籍少詩歌

在方志史研究中，北宋以前的方志性質的書，被稱為地理書，北宋之後才會以方志稱呼；根據青山定雄的整理，《吳地記》在《隋書經籍志》為正史類，於《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為地理類，¹³ 而兩宋吳地方志也多次援引《吳地記》。因此，就吳地方志演變來說，《吳地記》是直接的淵源。此外，藉由《吳地記》與兩宋的不同，也能凸顯變化軌跡。《吳地記》撰者為活動於晚唐僖宗時期（862-888）的陸廣微，曾被認為是北宋時作，但顧頡剛認為確為陸氏所作。¹⁴ 該志並無分門，以若干條目分別描述吳地樓觀、城池、山湖等等。通常描述方式為，先描述該地景的位置，接著簡略地描述它的歷史，例如「姑蘇臺」條目的內容：「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¹⁵ 有的條目較為詳細，會考釋名

12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

13 （日）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頁489。

14 《四庫提要》稱《吳地記》為宋人之作，顧頡剛考證版本，指出實為唐人陸廣微作，後遭宋人竄亂。見顧頡剛，《蘇州史志筆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吳地記》作於唐人，為宋人所竄亂」條，頁191-192。兩部宋代地誌版本，請參顧義義，《宋朝方志考》，頁46-49。

15 唐·陸廣微，《吳地記》（《叢書集成新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620。

稱典故，例如「松江」：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左傳》曰：「越伐吳，禦之笠澤。」其江之源，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二百六十里，入於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咸仲云：「松，容也。容裔之貌。」《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晉張翰仕齊王冏，在京師見秋風起，思松江鱸魚膾，遂命駕東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卒葬橫山東五里。¹⁶

《吳地記》對於有歷史的地景，會援引古籍說明之，甚至也羅列歷史人物典故。比如松江條目，先是引用《左傳》對於該地名稱的記載，接著描述松江特殊之處為「三江之口」，分別入小湖、海、震澤，故以帶有包容意味的「松」字為江名。又有《世說新語》中張翰思念吳中鱸魚膾，遂命駕便歸之典故，也一併載錄。¹⁷

《吳地記》描述地景所引用的材料，大多為古籍經典，除上述「松江」條目中的《左傳》、《尚書》之外，還有《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漢書》等，此外，也有先前地方志，例如《吳志》（今亡佚）、《風土記》（今亡佚）等等。對於文學作品引用的不多，僅有左思〈吳都賦〉、陸機〈吳趨行〉，可說比例上較低。

為何《吳地記》引用文學作品的比例較低，推測與該志描述地景的目的有關。若檢視兩篇文學作品的摘句引用，可知二篇被引用出於描述需要。例如「闔閭城」條目云：

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¹⁸

〈吳都賦〉旨在闡述吳地的壯麗與豐饒物產，闔閭城作為昔日吳國「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趾」的首都，側重描寫都城形構之跨麗。¹⁹《吳地記》

16 唐·陸廣微，《吳地記》，頁622。

17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識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393。

18 唐·陸廣微，《吳地記》，頁620。

19 晉·左思，〈吳都賦〉，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

引用目的與〈吳都賦〉宗旨不同，它描寫闔閭城只有必要資訊，何人所建、城都多大、都門數目，對於內部的樓觀略去不提。因此，《吳地記》引用〈吳都賦〉「通門二八，水道六衢」以佐證陸門、水門各八的描述。

《吳地記》引陸機〈吳趨行〉的條目為「閶門」：

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嵯峨，飛閣跨通波。」²⁰

〈吳趨行〉是樂府民歌，陸機以民歌方式詠懷離開吳地的心情。在〈吳趨行〉中，詩人是由閶門離開吳城，「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²¹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引用詩文的目的並不在該詩文的文學價值，而是證明該地景在過去曾經存在，因此，往往只會擷取出現地景名稱的句子。如果方志撰者將詩文的文學性納入考量，那麼至少會一併摘引詩人的抒情動機，也就是連帶引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單看「閶門勢嵯峨，飛閣跨通波」的描述並不會有詩意與抒情性。

晚唐《吳地記》對於吳地的描述方法是分別以條目敘述地景，內容簡要描述該地景的歷史、規模、構造。地志所引用的材料，多是經典古籍，文學作品僅有兩例。這是由於撰者目的是客觀的描述該地，屬於私人情感的文學作品並不能符合此目的。因此，儘管是引用文學作品，單看摘句也不能呈現該篇作品的文學性，可視為去文學化的摘引方式。

《吳地記》作為吳地描寫的典範，制定了基礎的寫法規範，往後南北宋的兩部方志依然見其規模取法。有意思的是，宋代兩部方志在規模取法之餘，也增添許多元素，從中可見對營造地方的策略有所差異。以下分析將略去方志間的傳承或固有寫法規範，著重個別方志的新變部分。

（二）北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詩歌與史籍並重

朱長文（1039-1098）為北宋蘇州吳縣人，早年「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²² 在元豐（1078-1085）、元佑（1086-1094）

文》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74，頁1885。

20 唐·陸廣微，《吳地記》，頁620。

21 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72。

22 元·脫脫等著，〈朱長文傳〉，《宋史》（《二十四史》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

時期便廣為人知，常與當地太守友好，《吳郡圖經續記》便是在太守晏知止、章帖先後過問下，元豐初年便已見規模，後經稍加潤飾，獻於元豐七年（1084），使之「置諸郡府，用備諮閱」。²³ 朱長文曾有序文提到此書的沿革與宗旨。序文提到，《圖經》本為州官命人修纂，為治理該地的基本資料，隨著州官的重視程度，每部《圖經》的詳略程度不一。如今，《圖經》因為年久失修、文字簡略而需要重新翻修。朱長文便受州官之命，「參考載籍，探摭舊聞」，利用查閱古籍與尋訪故舊耆老的方式，撰修《吳郡圖經續記》。²⁴

較之《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使用詩歌材料的意識揚升，據統計，三卷使用「詩」字共 69 次，摘引詩句的次數共 36 次，進一步計算摘引詩句所分布的詩人與次數如下：

詩 人	陸龜蒙	白居易	陸 機	劉禹錫	韋應物	其 他 (次數少於 3)
次 數	6	5	3	3	3	16

從統計來看，至少可以推知幾件事情：第一，《吳郡圖經續記》對詩人、詩作的重視大於《吳地記》；第二，《吳郡圖經續記》較之《吳地記》，唐代詩人大量出現，表格五位詩人中有四位是唐代詩人。由統計可知，朱長文仰仗唐人詩歌作為材料，增補唐時期的吳地人文與歷史。這些詩人及其詩歌在方志的出現，代表著撰者對於如何描寫地方的方法有所改易，關鍵在「參考載籍，探摭舊聞」的態度。以下從若干例子說明此態度的新創之處。

檢視《吳郡圖經續記》引詩方式，比起前部方志，更側重「參考載籍，探摭舊聞」的求證態度。例如，同樣是引用陸機對於「閭門」的描述，

1997)，卷 444，頁 3340。

23 宋·朱長文，〈四庫提要〉，《吳郡圖經續記》（《叢書集成新編》第 94 冊），頁 628。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吳郡圖經續記》，頁 628-629。關於朱長文生平、交遊與編成《吳郡圖經續記》的細節，可參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451-488。

24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吳郡圖經續記》，頁 628-629。

朱長文云：「自吳亡至今僅二千載，更歷秦、漢、隋、唐之間，其城減、門名，循而不變。陸機詩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其物象猶存焉。」²⁵ 從「不變」、「猶存」推斷，撰者傾向將現地物象與典籍舊聞、詩歌作品互相比對，具有一定可信程度才納入方志。此外，朱長文除沿襲《吳地記》的描述，也會增收詩例。例如，在闔閭城門的描述，除沿用〈吳都賦〉，也採用了劉禹錫（772-842）「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之句。由前述二例可說撰者以史料的態度看待詩歌，在下列例子中，詩歌作為史料的彈性比古籍來得更高，且能補足古籍所未及之處。

《吳郡圖經續記》有的條目以詩歌作為史料。比如「包山廟」條云：「包山廟，在洞庭。唐人于此有祈而應。魯望詩曰：『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²⁶ 若回顧陸龜蒙（836?-881?，字魯望）該詩脈絡「將命禮且潔，所祈年不凶。終當以疏聞，特用諸侯封。」指向唱和皮日休（834?-883?）代刺史祭祀太湖而作，可知「有祈而應」乃就皮陸交往的史實而言。又例如「吳江利往橋」，最末提到橋上的垂虹亭「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非虛語也。」²⁷ 所謂「非虛語」的判斷出自撰者考實的態度而來，已將「詩歌經驗」的感受作為史料。也有透過詩歌描寫來考察今昔差異，例如「臨頓橋」云：「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者，亦吳時館名也。陸魯望嘗居其旁，皮日休贈之詩，以謂『不出郭郭，曠若郊野』。今此橋民居櫛比，蓋此郡又盛于唐世也。」²⁸ 又或是以詩歌考釋人物，「洞真宮」云：「洞真宮，《圖經》云：『在古毛公壇上』。據皮、陸詩，毛公者，劉根也。陸詩云：『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輕。』」²⁹ 上述幾例來看，撰者是將詩歌視為史料使用。

上述幾例，旨在證明朱長文「參考載籍，探摭舊聞」的態度，是將當今所見與古籍互相印證，由於詩歌的印證功能不亞於古籍，使得古

25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629。

26 同上註。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29 同上註。

籍與詩歌能夠並重；而詩歌經驗作為材料，它不僅是《吳地記》所注重的名目，也有將詩歌的背景（例如包山廟「有祈而應」之例）以及詩歌中的場景描寫（例如蘇軾詩之例）納入方志書寫之中。此雖還未到以詩歌的文學性作為方志書寫的一環，但相對《吳地記》已然鬆綁許多。此外，《吳郡圖經續記》已經有以詩人作意為史料的情形，詳下述。

《吳郡圖經續記》以詩人作意作為史料證據，是在難以適切地用其他文獻證明的情況。例如「承天寺」條：

承天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故傳是梁時陸僧瓚故宅，因睹祥雲重重所覆，請舍宅，為重雲寺。中誤書為重玄，遂名之。韋蘇州〈登寺閣詩〉云：「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即此寺也。³⁰

從上下文看，撰者引韋應物（737-791，曾任蘇州刺史得名）〈登重玄寺閣〉詩似乎並非扣著「重玄」、「重雲」、「承天」等寺名由來，而是從記載地方人物曾活動之遺跡的目的援引此詩。細看詩作內容，「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描述閒暇時登上高寺，在寺閣所見光線穿過雲層時的光影，其後四句描寫自寺閣所見的吳都景致。撰者之所以引述此詩，也有首句特用「雲構」的特殊詞彙來呼應本為「重雲」之名的考量。不只如此，撰者還多引了四句說明從寺閣所望吳都的景致，也有強化理據的意味。自「重雲寺」、「重玄寺」到「承天寺」的曲折過程，並無直接證據，但從前人詩歌所見與當今之對應，便能加強可信程度。

上述幾例說明《吳郡圖經續記》在運用詩歌材料的面向與內容都超出《吳地記》，這是由於朱長文「參考載籍，採摭舊聞」的寫作方針，連帶古籍與詩歌並重所致。「參考載籍，採摭舊聞」講究的是將當今所見與古籍相互結合，而詩歌材料也成為見證之一。《吳郡圖經續記》在引用詩歌之後的敘述中有所多類似的套語，例如「即此寺／地／水也」、「信然也」、「非虛語也」等，充分顯示該志強調見證的性質。往後的《吳郡志》深受影響，並進一步賦予詩歌不同於古籍的獨立功能，詳下述。

30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634。

（三）南宋范成大《吳郡志》詩歌具獨立功能

前述兩種吳地方志對於詩歌材料的運用情形，晚唐《吳地記》多用史籍少引詩歌，北宋《吳郡圖經續記》史籍詩歌並重，到了南宋《吳郡志》在引用詩歌的質與量兩方面，都較過去有大幅的增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吳郡志》「徵引浩博而述敘檢核，為地志之善本」，乃著眼於該志統合廣博的材料，言簡意賅地納入各個條目之下，雖然，清代章學誠批評《吳郡志》的分類有不嚴謹處，但無損這部方志的價值。據統計，全志所引書目多達一百五十種，詩歌有一百七十家，³¹ 對比於《吳地記》所引詩人不過十數家，可見「徵引浩博」之語不虛。

《吳郡志》引用詩歌的方式與以往方志不同，主要是在設立條目的標準以及全篇引用兩方面。以下從體例方面說明兩方面對於傳統方志的新變之處，之後第三、四節說明此新變如何形塑地景。

1. 設立條目標準

《吳地記》當中是以古籍所載的地點為主，詩歌只是次要材料；《吳郡圖經續記》則會以詩歌為史料。到了《吳郡志》已不全然如此，而是有另外考量。《吳郡志》會以詩歌為主軸設立條目，例如皮、陸關於太湖的唱和組詩以往被濃縮於一條之中，但在《吳郡志》則被拆分設立為不同條目。先看《吳郡圖經續記》對於皮、陸的太湖組詩的描述：

包山，在震澤中。……舊傳震澤有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樂天嘗泛舟洞庭，著於篇什。陸龜蒙、皮日休有〈太湖〉詩二十篇，如神景宮、毛公壇、縹緲峰、桃花塢、明月灣、練瀆、投龍潭、孤園村、上真觀、銷夏灣、聖姑廟、崦裏、石版之類，皆在此山。³²

撰者提到〈太湖〉組詩，與提及樂天嘗泛舟於洞庭一般，都是證明此湖中之山曾見載於唐人詩歌中，可見朱長文雖注意到這批新材料，但不認為此與其他詩歌有所區別。這段文字的重要性是，這是〈太湖〉組詩首次出現在吳地方志，且已經將各詩題到的地景一一陳述。

31 陸振岳，〈點校說明〉，收入宋·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4。

32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636。

《吳郡志》對於〈太湖〉組詩的態度，也有如《吳郡圖經續記》的目的，但更強調〈太湖〉組詩營造地景的作用力，並依此獨立條目。在「太湖」條目下，先引《越絕書》、《爾雅》描述太湖位置，之後引述白居易（772-846）、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詩歌，作為此地的詩歌材料。《吳郡志》新變之處在於，在「太湖」條目之後，新列許多子條目：明月灣、練瀆、消夏灣、投龍潭，且各條目所陳列材料幾乎包含〈太湖〉組詩，例如「明月灣」云：「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³³ 這些地景以往非為獨立條目，也有的被置入在其他條目的敘述當中，如練瀆、消夏灣就被放到「洞庭」之下。到了《吳郡志》，這些地景被收納至「太湖」底下，各條目之下所繫的材料正是〈太湖〉組詩。由此反推《吳郡志》獨立條目的關鍵因素，很可能出於皮、陸的〈太湖〉組詩的篇章就是以若干小景點為題，共組成一個大型的太湖地景。且從方志「詳」、「博」的特色來看，條目下只繫一兩首詩歌材料，可說撰志者認為這些材料足以使人認識到此地景。也應注意到，並不是歷來沒有寫相關地景的詩作，范成大多選取〈太湖〉組詩，可見特別重視這些詩作能表現地景的性質。這種運用詩歌材料的案例在前述《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並無出現，可說是《吳郡志》的新變。相似的例子還有「投龍潭」、「交讓瀆」、「庵裏」、「石板」等，於此不贅。

需要補充的是，《吳郡志》也有很多只有敘述文字沒有補充材料的條目，這是依據范成大長年居住鄉里所聞所見而來；這並不妨礙本文主張撰者因為詩歌材料而設立條目。上述例子可證，范成大延續著前人史籍與詩歌並重的書寫態度，進一步將詩歌材料賦予更高價值，使得某些地景成為獨立條目。獨立條目在方志書寫的意義在於，詩歌材料的價值不亞於古籍，此為以往方志未見，是《吳郡志》新創之體例。不只是因詩歌材料而獨立條目，《吳郡志》引用詩歌的方式也是新創，詳下述。

2. 全篇引用

前結提到《吳郡志》設立條目會因詩歌材料而獨立條目，此為過去未有的方志慣例。本節接著說明《吳郡志》引詩體例另一個新創——全

33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251。

篇引用。James Hargett 認為，《吳郡志》頻繁地引用是「學術地方專著」(scholarly local monograph)的必要成分，牽涉到宋代學者如何分類與傳播知識，然論者未深入分析《吳郡志》大量且全篇引用的效果。³⁴

前述提到，《吳郡志》所引書目多達一百五十種，其中有許多關於宋代地方的沿革，是透過記、序等材料呈現。例如，「三高祠」為宋代吳地建立的祠廟，紀念范蠡、張翰、陸龜蒙三位高賢之士，該祠歷經改地、翻新，范成大全篇引用祝鑑〈三高祠記〉與自己的〈三高祠記〉將這段過程詳細地呈現，後引程俱〈三高堂詩序〉為前述二篇之補充材料。兩篇記文與序文之後，范成大列出蘇軾(1037-1101)〈書三賢畫詩〉的詩歌材料，也是全篇引用。從效果來說，在記、序方面，全篇引用能詳實地展示地景的沿革，以及與該地景相關的人物、時間等；而詩歌全篇引用的用意有別於記、序文。

蘇軾〈書三賢畫詩〉作於寧熙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時，此時尚無三高祠，但已有「三賢」之名，這應是早期將范蠡(536-448 BCE)、張翰(西晉人物)、陸龜蒙並稱的文獻材料，但這仍不足以說明為何要全篇引用。若考慮到〈書三賢畫詩〉內容旨在歌詠三位賢人(高人)，或可推測其作意是凸顯三高的隱逸形象，正能作為記、序描寫人物生平，較少敘及隱居樣貌的補充。

范蠡：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

張翰：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且為鱸魚也自賢。

陸龜蒙：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³⁵

細看三首詩的全文，並不能直接連結到三高祠的相關訊息，但能更進一步的知悉「三賢(三高)」的形象。祝鑑、范成大的記文中可見對於三位賢人的生平行跡，而詩歌所呈現三賢形象特化了隱逸者超絕的德性。例如，蘇軾筆下的范蠡，能夠「長笑申公為夏姬」，並用麋鹿姑蘇的典故，

34 James M. 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p. 423.

35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176。范、張、陸姓名為筆者所加。

渲染隱逸高士的形象。張翰的形象是不涉世俗的隱逸者，即使《世說新語》有任官的事蹟，也強調思鱸魚膾而命架東歸的灑脫。陸龜蒙形象注重窮而守道的氣節，末句援引養鴨的傳說強化不為錢財所動的形象。三賢的描寫各有偏重，若對比記文的描述，詩文更能凸顯三位隱居後不為世俗價值所限的形象。

綜上述，《吳郡志》全篇引用的必要性是區別記、序所無法涵蓋的描寫性或文學性，而撰者所要凸顯的面向取決於對詩歌材料的取捨（將在下節討論）。若結合前面獨立條目來看，《吳郡志》對於兩種引詩體例上的新創，反映出對於詩歌材料的態度有別於前人，且賦予詩歌於方志中的自身價值。由此，詩歌材料對於方志書寫而言已經不只是史料價值，也注重詩歌的文學性質。下面兩節將各以地景、土物為例，說明范成大運用詩歌材料的方式與特色。

三、詩歌材料的取捨：《吳郡志》對地景的塑造方式

上節簡要爬梳歷代吳地方志詩歌引用情形，可說《吳郡志》對於詩歌獨特的引用方式是范成大的新創。在引用詩歌的數量與方式之外，范成大如何運用詩歌材料也是重要關鍵，這涉及撰志者收錄、捨去、排列詩歌材料的用意或目的。本節將透過若干例子說明，《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時，進一步地將具有「想像」的文學性質也考慮進去，基於此而來的想像，使得地景的描述立體、鮮明。³⁶

36 此處「想像」的文學性質，延展自淺見洋二對於宋人「拾得」現象的討論。論者指出，宋人不只是由內而外的創作詩歌，也會說詩是從外在世界「拾得」；這個現象反映的將外在世界視為詩材的詩學觀念，人與不同風景的相遇，從中取材，便能生產出許多詩歌。反過來說，當同一片風景被不同詩人造訪，所留下來的詩，也會有同與不同的描寫，因此會有詩人在面對風景時想起另一個詩人或詩境的現象。論者以陸游為例，分析「伏几讀書時舉頭，萬象爭陳陶謝句」，說道「可見有時也會在詩中加上某位特定詩人的名字（這裡是陶淵明、謝靈運），大概是在風景中找到了能夠使人聯想起該詩人作品的詩意世界吧。」（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日）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論「拾得」歌詩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頁449。以《吳郡志》來說，地景條目引用詩歌材料，除了基於詩歌的史料性質，也能見得淺見洋二所指出

詩歌納入方志的現象有多種價值，譚清洋著重在詩歌史料價值，筆者則討論地志書寫與詩歌材料之間的關係。譚清洋以「滄浪亭」為例，認為該條目所臚列的蘇舜欽、歐陽修、胡宿、胡理、梅堯臣、劉敬的成組詩歌，雖非一時一地之作，但彼此間具有強烈的相關性。³⁷若考慮《吳郡志》納詩入志的新創體例「獨立條目」與「全篇引用」，滄浪亭在《吳郡圖經續記》與《吳郡志》當中敘述與材料的差異便是值得深入之處。滄浪亭在《吳郡圖經續記》節錄如下：

蘇子美滄浪亭，在郡學東。子美既以事廢，乃南遊吳中。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木鬱然，崇阜廣水，並水得微徑于雜花修竹之間，趨數百步有棄地，乃中吳節度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子美買地作亭，號曰「滄浪」，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諸公多為之賦詩。³⁸

朱長文的敘述重點在滄浪亭的設置與周圍環境，這些描寫取自蘇舜欽〈滄浪亭記〉，他也注意到「諸公多為之賦詩」，但未將這些詩歌作品列出。《吳郡志》的敘述略去建亭之由，旨在陳述滄浪亭的來由與成名之因：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璪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³⁹

范成大簡省「東顧草木鬱然，崇阜廣水，並水得微徑于雜花修竹之間」的描述性文字，這並非認為不必要而刪去，就前節的分析，乃是此描述性的功能由詩歌材料擔任，因此在體例上將詩歌材料全文附於敘述之後。若看滄浪亭條目的引用材料即可得證：先後是蘇舜欽〈滄浪亭記〉、〈滄浪詩〉、〈滄浪觀魚〉、〈滄浪靜吟〉、〈滄浪懷友〉、〈獨步〉、〈初晴游〉、歐陽修、胡宿、胡理〈滄浪亭〉、梅堯臣〈寄題滄浪亭〉、劉敬〈觀滄浪亭

宋人的詩歌觀念，由於閱讀方志時並不能身歷其境，乃藉由詩歌閱讀來「想像」地景，此與「拾得」取得詩材是相反的過程，但原理相同，背後是相同的詩學觀念。

37 譚清洋，〈地理學家的詩人底色——范成大《吳郡志》的詩歌史料價值〉，頁74。

38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640。

39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188。

石感而有作)。從排列上來看，蘇舜欽為滄浪亭主人，《吳郡志》收錄了六首詩歌，其後是歐陽修詩作，呼應敘述的摘引詩句，再後才是兩位相關的詩歌。依照譚清洋的說法，這些詩作提出可以看出詩人彼此之間的唱和關係，但范成大作意恐不止如此，若要強調文人彼此間的唱和往事，那麼不需要引六首蘇舜欽詩，只需共同唱和的〈滄浪亭〉即可，不在唱和之列的劉敬也不必列入。職是，從方志書寫的角度而言，這些記文、詩歌材料的引用，並非聚焦在文人唱和詩歌，而是凸顯「滄浪亭」本身的形象與特色，全篇引用的用意也在於此。⁴⁰

從《吳郡志》方志書寫的角度來看，滄浪亭的詩歌材料取舍有其用意。舉例來說，蘇舜欽〈獨步〉、〈初晴游〉二首，全文皆未提滄浪，卻成為材料，這在過去方志相當罕見。細看二詩描寫花、草、竹、雲、水的景致，與〈滄浪亭記〉「前竹後水」、「澄川翠幹」情調契合，有助於凸顯滄浪亭形象，同時補足條目敘述省略的描述性文字。滄浪亭這類的例子不算少見，以下再以太湖為例，說明《吳郡志》如何運用詩歌材料來塑造地景。

太湖為吳地富有歷史與人文的地景，晚唐《吳地記》的太湖條目引用《漢書志》、《越絕書》、《國語》、《吳錄》、《揚州記》、《洞庭山記》等古籍，描述太湖的面積、位置、別名、傳說等等。到了《吳郡圖經續記》才開始提到詩歌作品：

包山，在震澤中。……舊傳震澤有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樂天嘗泛舟洞庭，著於篇什。陸龜蒙、皮日休有〈太湖〉詩二十篇，如神景宮、毛公壇、縹緲峰、桃花塢、明月灣、練瀆、投龍潭、孤園村、上真觀、銷夏灣、聖姑廟、崦裏、石版之類，皆在此山。⁴¹

震澤即是太湖，包山是太湖中的群山之一，自古而來被列為仙地。⁴² 其後《吳郡志》將太湖底下的若干地景各自獨立為條目，更加豐富太湖

40 敘述重點從「人」到「亭」之間的轉移，在土物類更加明顯，詳見下節。

41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 636。

42 《吳郡圖經續記》也有記載：「太湖，在吳縣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頁 636。

的描述。前文已述，這些新獨立出來的地景，相當程度地參考皮、陸的〈太湖〉組詩的題名方式。以「明月灣」為例，《吳郡志》敘述為：「在太湖洞庭山下」，後引了兩首分別由皮日休、陸龜蒙的詩：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
半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鬘。
松癭忽似狖，石文或如巖。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斑斑。
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
曉培橘栽去，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
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處住，好處無境刪。
赧然不自適，脈脈當湖山。（皮日休〈太湖詩·明月灣〉）

昔聞明月觀，祇傷荒野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
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
周迴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
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鏘跳，積漸調參差。
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蹤舞玉煙節，高歌碧霜詞。
清光悄不動，萬象寒咿咿。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
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

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陸龜蒙〈奉和襲美太湖詩二十首·明月灣〉）⁴³

從題名看，此為皮、陸唱和之作，兩首之間非嚴格的對應關係，是和意的作品。比較皮、陸描寫的明月灣，前者有許多對景物的描寫：首先遠觀整體感受「半巖翡翠巢」，接著寫視線較低的柳、藤，之後是較高的松、石，然後是明月灣的人跡，有釣壇、野人、白屋等，最末詩人認為明月灣有世外之感，「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陸龜蒙描繪的明月灣則以「奇」字概括，在於此灣位置在島中群山隱匿的一角，且灣內湖面一片澄清平靜。這裡詩人插入一段神仙降臨故事，起初聽聞樂器聲音，逐漸喧騰，儀仗自空中降至湖面縱歌縱舞，隨著降臨的清冷光芒持續一

43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251-252。兩詩原題為筆者所加。

段時間之後回歸寂靜。據何錫光的說法，這段逸事指昔年南朝皇帝玩樂之事，據《姑蘇志》也可以指「吳王玩月處」。⁴⁴ 但范成大並未提及此，或許是這種說法未見於前代方志，也可能只想藉著兩詩表達明月灣非凡俗之地，不涉吳王玩月的弦外之音。

可以注意的是，在滄浪亭、明月灣的例子中，所引用的詩歌材料有許多描述地景的句子，容易讓讀者好似身歷其境地感受地景。這種塑造方式，在筆者看來是全篇引用的特色與優勢；換言之，以全篇徵引的方式排列材料，材料的渲染能力更強，因此也需要經過編纂者的斟酌、挑選。

范成大對於詩歌材料並不是一概而取，「被排除」的選擇也可見其塑造方式。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有〈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劉長卿有〈明月灣尋賀九不遇〉，都是與明月灣相關之詩，卻沒有納入方志。先將兩首列於下：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灣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泓澄潭水一盆油。
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碧流。為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⁴⁵

楚水日夜綠，傍江春草深。青青遙滿目，萬里傷歸心。
故人川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故人不在明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⁴⁶

若相比皮、陸詩，白居易詩所描寫的是夜泛明月灣的舟船，例如「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腳紅旗蘸碧流」為描寫夜中身居舟內所見；劉長卿著重在尋友人的思念，例如「故人川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對於明月灣較未深入描寫。兩詩皆以明月灣為背景，旨在陳述人事之情。從詩意的比對便能理解皮、陸詩納入方志，而捨棄白、劉之詩。

44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228。明·王鏊，《姑蘇志》（《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8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卷33，頁25。

45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2，頁1895。

46 唐·劉長卿著，楊世明校注，《劉長卿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117。

另一個例子是舊時在木蘭堂後的「北池」，范成大實地考察，比對唐、宋人詩賦中描述的地景，發現到了南宋，北池已較原本的木蘭後池縮小許多。此地曾有唐代詩人白居易、韋應物、皮日休、陸龜蒙等人賦詩作題，宋代更有詩詠、賦作，可說是歷久不衰的地景。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⁴⁷

若將范成大對北池的描述與蔣堂（980-1054）〈北池賦並序〉序文相對照，〈北池賦並序〉云：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館涼。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詒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余景佑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常賦北池宴集詩。⁴⁸

將兩段文字對照，最明顯的差異是范成大並不同意蔣堂「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之語，修改為「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此修改意味著范成大將「北池」視為「木蘭後池」，而他依據的文獻是皮、陸的三詠，所謂「唐在木蘭堂後」也就是就皮日休「木蘭後池」的詩題而來。然而，范成大對於此是較為猶豫的，因為北池的位置與文獻中後池的位置有異，因此猜測：「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將北池視為後池的「部分」。范成大透過詩歌材料的選擇，試圖重塑唐代後池原來得樣貌，詳下述。

范成大使用的詩歌材料，有皮日休〈木蘭後池重臺蓮花〉、〈浮萍〉、〈白蓮〉，陸龜蒙〈和重臺蓮〉、〈浮萍〉、〈白蓮〉，最後是蔣堂〈和梅摯北池十詠〉，分別詠檜、島、竹、柳、菊、池、宴、鶴、鹿。這些詩歌大多

47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54。

48 宋·蔣堂，〈北池賦並序〉，《春卿遺稿》（《叢書集成續編》第16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592。

是「詠物」詩，是詩人身處北池或後池選取一景加以歌詠的作品。這些作品是被選擇的詩歌材料，有些則被排除在外，在〈北池賦並序〉當中提到的「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館涼」即是韋應物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然而未被《吳郡志》納為材料。究其原因，是皮、陸、蔣的詩歌主題是描寫地景，而韋應物雖也同於此地創作，但主題是燕集之感，較少描述地景。因此，從詩歌材料的共通性來看，范成大對於地景條目內應該要有什麼詩歌材料，有一定的條件與意識。

除了上述對詩歌材料的取舍之外，材料的順序也能傳達對地景的想像。例如，「白雲泉」先引白居易〈白雲泉〉詩、范仲淹〈天平山白雲泉〉詩，再引陳純臣〈薦白雲泉書〉文，最後是錢藻〈天平山白雲泉〉詩。⁴⁹這個例子並不是常規地按照文、詩的順序，也不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而先從最相關性最高的白居易、范仲淹詩，其次為陳淳臣文、錢藻詩。筆者認為，「相關性」的依據要從材料內容來解讀，白居易的絕句詩為：「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間。」先描述白雲泉猶自天上來，後描寫白雲泉自天上奔下人間之勢。雖只有四句，卻緊扣白雲泉的樣貌與給人的感受。其後，范仲淹也就著白雲泉的特色加以敷衍成篇：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龍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常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⁵⁰

來回比較白居易、范仲淹詩，兩人同樣描寫白雲泉自高處洩下的奔衝之姿，范仲淹進一步描寫其味道（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以及泉水落下之聲勢（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中段括寫白雲泉所在之景，末段則借此情景抒懷一番。〈薦白雲泉書〉則是有段描寫白雲泉之功用：「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

49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1。

50 同上註。

泉潔而清。倘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礪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⁵¹ 錢藻的詩被放在最末：「白雲岩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墊寒雷。源從天漠星邊落，流自鰲峰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⁵² 雖然，此詩以白雲泉為題，相比之下，白雲泉的特色——源自高處、奔衝而下，在此詩當中並不凸顯，雖然有「源從天漠星邊落，流自鰲峰海上回」之句，形容白雲泉源自天上，後流到海之上，也有由上到下的流動描寫，但相比白居易、范仲淹，詩境上強調的流動感有所差異。

從「白雲泉」的四則材料解析當中，可以看到白居易、范仲淹的詩歌對於白雲泉的形象描寫較為相似，後兩則材料，一者提及白雲泉之功用，另一者雖也是詩歌，但形象描寫與白居易、范仲淹較為不同。本來，每個人對於景點的描寫都會有所不同，但是，范成大透過排列的方式，讓讀者會以先閱讀到的、重複的詩歌形象為主要印象，而後才是其他材料。筆者認為，這種排列詩歌材料的方式帶有形塑地景的意義。雖然，從詩歌材料排列的角度解釋地景的塑造，沒有其他證據可以加以證明，但就讀者感受而言，此方式有助於使白雲泉的形象較為立體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綜合上述，從方志書寫角度來看，地景的敘述與詩歌材料已經互相搭配，各司其職，詩歌材料的選擇以能描繪地景為主，因此，對於地景有大量描述的作品，如皮日休、陸龜蒙的詩歌被引用的數量大於其他詩人。在「明月灣」、「北池」兩個例子則能見范成大運用詩歌的方式，透過「選擇」與「被排除」的詩作比較，可以看到被選擇的材料，確實更能使讀者體會地景。在「白雲泉」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材料的「順序」對於地景形塑的重要性。上述運用詩歌材料的方式，比起過去方志所塑造的地景，顯得更加豐富、細緻。

51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1-432。

52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2。

四、敘述的主次調整：《吳郡志》運用詠物詩描寫土物的方式

《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新創不只在描述地景，也透過敘述與詩歌材料的搭配來呈現吳地風俗土物。范成大描寫吳地風俗土物，除實際所見之外，也從古籍、詩歌當中尋找相關記載，而詩歌材料多是詠物詩。就方志書寫的角度來說，詠物詩除了歌詠、描述某物外，也往往就此抒發詩人的性情，要如何從中間提煉出「地方」感，便需要在敘述中有適當的調整。本節以土物類為例，觀察范成大如何調整敘述與詩歌材料，以凸顯詠物詩的地方性質。

一般來說，「詠物詩」是針對某物的描寫，其出處、滋味、外型都是描寫的內涵，容易有「此地之物」的印象。例如，「蠟櫻桃」的敘述與引詩如下：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

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

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

烏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蹋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白樂天〈吳櫻桃〉⁵³

先看蠟櫻桃的敘述，范成大描述蠟櫻桃的方式移自譜錄，特別是描述物種的色澤、味道，以及「品評」各種高下的傾向。⁵⁴ 若參照土物類的菊、梅兩類，范成大將自著的《菊譜》、《梅譜》收入《吳郡志》，內容描述菊、梅的品種、外觀、來歷等等，大體與蠟櫻桃的敘述方式相同，差別是菊、梅多是敘述、少以詩歌為證據。接著看為何此條目會引詩歌為據。白居易的〈吳櫻桃〉重在描述吳櫻桃的產地、香色、結果情形、眾人相爭摘取的現象等等。范成大以白居易詩為據，旨在說明此乃自唐代就有的地方物種，而品高者出自常熟。從此條目的敘述與詩歌兩面的搭

53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46-447。

54 范成大嗜於「品評」各種土物，此在譜錄著作中尤為明顯。范成大，《梅譜》、《菊譜》，收入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47-262、頁263-274。

配來看，詩歌材料並非是決定性的證據，它只證明了「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其後的敘述與詩較無關聯。然而，范成大特將此詩納入方志中，還有點出「吳中櫻桃」的目的，由於詩歌對於吳人相爭採食的描寫，才會塑造出吳櫻桃之於吳中風俗的意義；也可以說，正是此詩賦予吳櫻桃為「吳中風味」的內涵。

對於方志撰者而言，〈吳櫻桃〉是理想的詩歌材料，因為該詩大量描寫了吳櫻桃的不同方面，但並非所有詠物詩的主旨都是純粹詠物，在中國「香草美人」傳統影響下，詩人往往借詠物以自傷。⁵⁵ 范成大在面對這類作品時，採取的是調整敘述側重面的方式。以陸龜蒙為例，他隱居笠澤，著有詩集《松陵倡和集》收錄皮、陸唱和詩作，與詩文集《笠澤叢書》收錄陸龜蒙晚年隱居笠澤的詩文作品。前述明月灣、木蘭堂後池皆是皮、陸唱和之作，陸龜蒙隱居後的事跡、作品，多在《吳郡志》土物門的「綠頭鴨」、「鵪鶉」條目。在這些條目中，陸龜蒙的隱士生活、心境藉由方志轉化為以「物」為主的描寫。例如，在「綠頭鴨」記載陸龜蒙飼養綠頭鴨的隱居佚事，也見於唐末《聞奇錄》、北宋《楊文公談苑》，蘇軾詩「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也扣著此事，可見陸龜蒙飼養綠頭鴨的形象遲至宋代已經成形。《吳郡志》將陸龜蒙形象納入「綠頭鴨」條目，凸顯「物」性質，將原本個人的「此人的佚事」轉化為「此物的逸事」。

撰者敘述焦點由人轉移到物的另一個例子是「鵪鶉」。「鵪鶉」早在左思〈吳都賦〉便有提及，《吳郡圖經續記》也有記載，但《吳郡志》不引用上述文獻，僅列出陸龜蒙詩：

鵪鶉，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為賦詩焉：詞賦曾誇鸚鵡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疏籠晚，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栽書謝白鷗。⁵⁶

55 例如，范成大在土物的「白芷」以陸龜蒙〈採藥〉詩為據，但陸龜蒙自序已明言：「香草美人，得此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范成大是在知道詩人作意的前提下，將詩歌納入方志當中。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54。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900。

56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4-435。

比對《吳郡志》與陸龜蒙〈鵪鶉〉詩的自序：「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鵪鶉者貺余。黑襟青脛，碧爪丹喙，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甚卑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⁵⁷ 撰者對於鵪鶉的描述與陸龜蒙自序吻合，為此條的主要資料來源。細讀兩者差異，陸龜蒙立意在抒懷此「真天地之窮鳥也」，乃有其詩作，《吳郡志》則省去此語，著重在「囚錄籠檻」的事件。這種改寫詩序、保留詩文的做法，將側重面從「人」轉移到「物」，調整了對詩文的認知。以往，我們習慣從作品的文學性探討詩人對物的情意，但在方志以物為主的土物門，詩人對物的動機並非首要，而是著重在關於物的相關事件——「鵪鶉曾被陸龜蒙囚錄籠檻，而有詩云」與「陸龜蒙哀其野逸性，非以能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兩者側重面並不相同，如此改寫可說是范成大的作意。

前述「綠頭鴨」、「鵪鶉」之例，焦點均是由人轉移到物，此調整是將物納入方志體系的書寫策略，這不是淡化人物色彩（因為正文仍提及陸龜蒙），而是為了凸顯此為吳地之物。即是說，藉由敘述的主次調整，物的書寫成為形塑地景的材料。需要補充的是，僅有部分土物才会有敘述的調整，如果此物已是為人熟知的特產，如「太湖石」便有許多文獻述及，便較少有此情形；如果此物各地皆有，那麼范成大會傾向於聚焦在特殊的事件或記憶，用以分別自身與他者，如上述「綠頭鴨」、「鵪鶉」因為有佚事與詩歌經驗而不同，從而使物與地方相連結。

「鶴媒」的例子也能凸顯撰者將人、物主次調換的作意，在兼具原詩含意的情況下也凸顯土物的殊異之處。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始行前，而以草木為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鳥見鶴，以為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⁵⁸

「鶴媒」是吳人所馴養的鶴，用以吸引其他野鶴，獵人在旁伺而獵取。陸龜蒙曾以鶴媒為喻，譏諷世人互相妒忌、陷害。若觀〈鶴媒歌〉，側重

57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468。

58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4。

面會放在諷刺部分：「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詔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妒侶害羣猶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⁵⁹ 陸龜蒙以不同視角解讀這個風俗，鶴媒在野外藉由「舞躍」來邀功、諂媚獵人，詩人視此行為「妒侶害羣」，類推到世俗社會中追逐名利、相互猜忌的人，發出「同類同聲真可畏」的感慨。方志書寫的側重不同，旨在介紹吳地特殊風俗，描述如何利用鶴媒打獵的過程。而〈鶴媒歌〉的作意雖非介紹鶴媒，但被視為鶴媒的相關材料。撰者也意識到方志與詩歌對同一物的側重不同，仍引用此詩並說明原始作意；整體而言，此條引用詩歌並非凸顯詩人旨意，而是介紹吳地風俗，經由調整敘述，「物」經由地方詩人的詩歌賦予其特殊性，「地方」的意義得以進入到物的方志書寫之中。

若是他地也習見的土物，便會省去一般敘述，以在地詩人的詩作為佐證。例如「蟹」條目中，撰者以皮、陸唱和中提及「嗜蟹」一事來代表吳人喜愛螃蟹：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也。⁶⁰

撰者以〈海蟹〉詩為例，說明吳人嗜蟹。依照陸龜蒙〈蠡志〉的考據，《禮經》、《國語》已有記載，⁶¹ 且現實中凡江湖海浦皆可見蟹；撰者刪略古籍、不敘述蟹的種類、捕食方式，僅採皮、陸唱和詩來說明吳人風俗，應是為了凸顯「吳地風俗」的緣故。在此脈絡下，皮、陸可說成為地方代言者，他們的詩歌經驗成為後人想像吳地的主要途徑，同時也使地方富有人文、歷史等多面層次。換言之，從《吳郡志》納詩入志的角度來說，他們的詩歌不僅是晚唐時代的產物，同時也是吳地的產物。

透過「綠頭鴨」、「鵲鵲」、「鶴媒」、「蟹」等條目的辨析，范成大將詠物詩納入方志體例之中會面臨到「人一物一地」的權衡問題，透過敘述側重面的調整，原本「香草美人」的詮釋路線會被大幅減低，取而代

59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1174。

60 宋·范成大，《吳郡志》，頁438。

61 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1173。

之的是凸顯該人、物與地方的關係。唯有范成大對於詩歌與方志都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才能夠適切地調整人、物的主次關係，此為《吳郡志》納詩入志現象的特色。

五、結 論

本文考察《吳郡志》納詩入志的現象，從比對唐宋三部吳地方志的引詩情形，發現唐宋以來方志對於詩歌材料的引用與重視漸增，又以《吳郡志》引詩的質、量都遠過前代。深入比較後，發現《吳郡志》之所以大量引用詩歌材料，是由於將詩歌賦予不同於記、敘文的特殊價值。此為《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新創。

接著，本文以「地景」與「土物」兩類為例，指出《吳郡志》以詩歌為材料所呈現的地方人文、歷史內涵，相較過去方志更加豐富、細緻，這是范成大透過諸多手段運用詩歌的結果。就《吳郡志》運用詩歌材料的方式來說，主要有選取、捨去、排列詩歌材料、調整敘述側重面等方式。在地景例子中，范成大運用詩歌材料的手法，大多為選取、捨去詩歌材料，有時記、詩的排列也有塑造地景的效果。在土物的例子中，范成大調整詠物詩以人為主到以物為主的述敘側重面，是將土物連結到地方的書寫方式。其他地方習見的土物便會省去介紹，直以詩作來凸顯吳人嗜蟹風俗。從上述來說，所謂納詩入志並非僅僅在羅列詩歌材料，而是需要兼備精確理解詩意，以及熟悉地志書寫兩個方面。經由上述，可以說納詩入志在方志史上有所新創與特色，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

將本研究與既有研究互相對照，或能就幾個面向反思：（一）研究指出，范成大的詩歌帶有「以筆記為詩」的傾向，是將志述、敘錄的態度帶進詩歌創作，又或是大西陽子透過范成大紀行文、紀行詩的比較，獲得兩者既相關又獨立的結論；⁶² 那麼，本文從方志與詩的關係，反向敘

62 程杰，〈論范成大以筆記為詩——兼及宋詩的一個藝術傾向〉，頁 52-56。（日）大西陽子，〈范成大に於ける紀行詩：紀行文「石湖三錄」との関連を中心に〉，《名古屋

說詩何以能帶有說明性質。⁶³ 這或許提示了在宋代詩、文能夠透過某種手段加以溝通與轉換。(二) 納詩入志在方志的意義是詩歌材料與其他材料的功能有所區別，透過本文分析，主要取用帶有描述性或文學性的詩歌。此種取詩、用詩的詩學特色，呼應著淺見洋二所指出唐宋詩學從抒情言志到詩中有畫的轉型。⁶⁴ (三) 包弼德、何瞻各從不同脈絡描述方志之於官方、地方的角色與功能，從《吳郡志》來看，它既不是受州官所託、也非全然基於地方家族精英的角度書寫，反倒有些私人興趣使然；這種紀錄地方風土、歷史人文的興趣，背後呼應的學術脈絡，應值得加以考慮。(四) 縱觀《吳郡志》引用詩人的組成，不只是文學史上習見的韋應物（曾任蘇州地方官，後人又稱韋蘇州）、白居易（曾任蘇杭地方官），最多的是晚唐皮、陸唱和詩作。⁶⁵ 這與陸龜蒙在宋代地位逐漸升高，與張翰、范蠡並稱「三高」也有關係。⁶⁶ 由此重審晚唐與南宋的關係，或有新的詮釋角度。

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5(1992.6): 25。

63 (日) 大西陽子從范成大紀行詩的詩題、序、注說明此為紀行文的功能。筆者則從《吳郡志》如何運用詩歌材料論述其說明功能，兩種研究雖同是研究詩、文關係，但角度有異。(日) 大西陽子，〈范成大に於ける紀行詩：紀行文「石湖三詠」との関連を中心に〉，頁23。

64 (日) 淺見洋二，《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距離與想象——中國的詩歌與媒體、作為媒體的詩歌〉，頁198-238。

65 范成大之所以大量納入皮、陸詩歌，從他的詩歌作品中或能窺見動機。范成大有〈白蓮堂〉：「白木參天護碧池，青錢弱葉戰漣漪。匆匆游子匆匆去，不見風清月冷時。」結尾呼應陸龜蒙名詩〈和木蘭後池三詠·白蓮〉：「素萼多蒙別豔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雖然地點不同但同詠一物，以「月曉風清」形容蓮花清高不欺的氣質，宛若天界下凡卻誣陷的仙女，盡顯楚楚可憐之貌。范成大途經白蓮堂，不見白蓮猶有此思，可見此連類想像深植吳地文人，猶勝曾任蘇州刺史白居易的白蓮諸詩，例如白居易〈種白蓮〉、〈白蓮池汎舟〉、〈感白蓮花〉等題。從范成大詩歌的白蓮印象，或可開展南宋詩人所注重的地方詩人等相關研究。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38。唐·陸龜蒙，《陸龜蒙全集校注》，頁668。

66 關於三高祠沿革，詳參：熊艷娥，「陸龜蒙及其詩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8），頁171-176。

以上四點，分別從范成大詩歌研究、唐宋詩學研究、方志史研究、晚唐接受史研究等角度說明與本文之關聯，可知《吳郡志》仍有許多待研究的議題，惟本文僅就納詩入志一面切入，其他議題待他篇另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陸廣微，《吳地記》，《叢書集成新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 唐·劉長卿著，楊世明校注，《劉長卿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叢書集成新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宋·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宋·蔣堂，《春卿遺稿》，《叢書集成續編》第16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元·脫脫等著，《宋史》，《二十四史》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王鏊，《姑蘇志》，《四庫全書珍本十集》第8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

二、近人論著

- (日) 大西陽子 1992 〈范成大に於ける紀行詩：紀行文「石湖三録」との関連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5(1992.6): 11-27。
- 中國方志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8 《中國方志大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呂志毅 2003 〈范成大《吳郡志》——吳地定型方志的界碑〉，《黑龍江史志》2003.6: 18-22。
- 林天蔚 1995 《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5。
- (日) 青山定雄 1963 《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 洪煥椿 1986 〈南宋方志學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學的形成〉，《史學史研究》1986.4: 14-22。
- 張國淦編著 1962 《中國古方志考》，北京：中華書局。
- (日) 淺見洋二著，金程宇、(日) 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程 杰 1989 〈論范成大以筆記為詩——兼及宋詩的一個藝術傾向〉，《南京師大學報》1989.4: 52-56。
- 黃 霖 2007 〈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文學評論》2007.5: 205-206。
- 黃奕珍 1998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臺北：文津。
- 楊 洋 2011 〈宋代方志的演變與發展——從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到范成大的《吳郡志》〉，《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3(2011.9): 20-23
- 熊艷娥 2008 「陸龜蒙及其詩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2008。
- 鄧小南 1995 〈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譚清洋 2015 〈地理學家的詩人底色——范成大《吳郡志》的詩歌史料價值〉，《哈爾濱學院學報》36.5: 71-75。
- 顧宏義 2010 《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顧頤剛 1987 《蘇州史志筆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Bol, Peter K 包弼德. 2001.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 37-76.
- Hargett, James M 何瞻. 1996.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1996): 405-442.
- Hargett, James M 何瞻. 2004. "Historiography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In Thomas H.C. Lee, ed.,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Arranging of Poems into Local Histories: The Innovative Employment of Poetry in Fan Chengda's *Wujun Zhi*

Lee Chi-hung*

Abstract

With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an Chengda 范成大 (1126-1193) is one of the four great poe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urthermore, his *Wujun zhi* 吳郡志, which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his life, is also an important work for studies on local histories. This article concerns a seldom discussed question within related scholarship: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writing local history? In other words, as Fan Chengda authored *Wujun zhi*, how did he arrange poems to formulate landscapes and convey the feeling of lo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is comprised of two main parts: (1) it illustrates the kind of innovative methods and new changes that *Wujun zhi* utilized to arrange poetry; (2) using descriptions of “landscapes” and “local objects of Wujun”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that Fan Chengda employed four ways of arranging poems to write local history: choosing, exclusion, sequencing, and adjusting the focus of narrative. Therefore, the so-called arranging of poems into local histories was not merely the listing of poetry in local history, but also demonstrates Fan Chengda deeply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 poems and the aspects of writing local history. In short, through its remarkable use of poetry, *Wujun zhi* shows a clearer and more vivid picture of local history, which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Keywords: Fan Chengda 范成大, *Wujun Zhi* 吳郡志, the Arranging of Poems into Local Histories, Local History

* Lee Chi-hu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